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唐初抗击突厥的比较

王景奇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以及唐朝初期抗击突厥一样,都获得了对外自卫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功。但抗日战争胜利是三次胜利中自卫一方在形势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就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抗日战争集中了西汉抗击匈奴战争和唐朝初期抗击突厥战争的优点,并把这两个优点发挥到几乎是极致的程度。这是抗日战争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击匈奴;抗击突厥

中图分类号:K265;K234.1;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1-0101-05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史学界和理论界评价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一般是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放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或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中进行评价。但如果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比较,也许会得出更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胜利也因为意义重大而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即西汉抗击匈奴胜利和唐朝初期抗击突厥胜利。在这里,不妨把抗日战争胜利同这两次胜利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从而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一、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以及唐初抗击突厥一样,都实现了对外来侵略进行自卫的长远性成功

抗日战争、西汉抗击匈奴以及唐初抗击突厥都是由于遭到外来侵略而进行自卫反击的正义性战争,而且都获得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功。所谓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功是指自卫反击战争对侵略者进行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侵略者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再也无力构成对自卫一方的威胁。抗日战争胜利、西汉抗击匈奴胜利以及唐初抗击突厥胜利都是基本符合这个标准的。

在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对匈奴进行沉重打击的战争都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尤其是汉武帝建元六年至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35至前119)这一段时间。在这十六年内,"汉兵凡九次出塞挞伐匈奴,前后斩虏总在十五万人以上,只最后元狩四年(前119)的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就斩虏了八九万人。"[1]183匈奴光在人口方面已受了致命的打击,"计汉初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万,后来纵有增加,在此期内壮丁的耗折总在全数一半以上。"[1]183在土地方面匈奴所受的损失也同样的大,"秦末再度沦陷于匈奴的河套一带给将军卫青恢复了……后昆邪王降汉,又献上今甘肃西北的'走廊地带',为匈奴国中最肥美的一片地……最后在元狩四年的一役,匈奴远遁至瀚海以北,汉把自朔方渡河以西至武威一带地也占领了。"[1]183-184匈奴由于受了这样的重创,在此后的十几年内,基本不再来侵寇汉朝。虽说在汉武帝晚年,匈奴又侵寇了汉朝并多有胜利,但那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在武帝死后三四十年内,"匈奴天灾人祸,外灾内忧,纷至沓来,弄成它向汉稽首称臣为止……终西汉之世,臣服中国不改。"[1]189继后的东汉时期,匈奴也未再对汉朝构成大的威胁。

在唐朝初期抗击突厥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发生在唐太宗时期。贞观三年(公元

收稿日期:2004-10-19

作者简介:王景奇(1975-),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明史和思想政治理论.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629),唐太宗命李靖出讨东突厥。第二年,李靖进击定襄,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被俘,男女来降者十万口"[2]442,东突厥灭亡。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唐太宗又遣李勣讨破突厥别部薛延陀,并于五年后,"灭之"[2]442。唐高宗时,唐朝又灭了西突厥。突厥对唐朝的威胁彻底解除。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歼灭日军133万人。加上日本战败后有128万多人向中国投降,共歼日军达260多万人[3]358。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的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得再拥有军队。因此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彻底消失。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样也是对外来侵略进行自卫具有长远意义成功的胜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日本军国主义改造不够彻底,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又有复苏、膨胀,成为影响亚洲周边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但这已是抗日战争胜利50多年后的事了,不能改变抗日战争胜利取得了对外自卫长远性成功的性质。

二、抗日战争胜利是三次胜利中自卫一方在形势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

虽然抗日战争、西汉抗击匈奴以及唐初抗击突厥都取得了具有伟大意义的胜利,但抗日战争实现这种胜利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西汉抗击匈奴和唐初抗击突厥的战争。后两次战争是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强汉盛唐"的时期进行的,其面临的敌我形势同抗日战争时期相比是大相径庭。

在汉武帝准备抗击匈奴的时候,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趋于繁荣。大史学家司马迁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景象:"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1]178总之,民力绰裕,财政也不成问题。再加上内患完全消灭,政权集中,完全具备了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从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看,双方可谓各有优势,而西汉的优势可能更大一些。著名史学家钱穆曾经说过,西汉的最大优势是:"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4]207此外,西汉在战斗本领上也是具有很多优势的,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晁错认为,西汉同匈奴相比,有5种长技:"1. 平原易地,轻车突骑……2. 劲弩长戟,射疏(广阔)及远……3. 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4. 材官(骑射之兵)驺(骤)发。矢道同的……5. 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1]179-180至于匈奴一方,其土地虽广,但大部分是沙漠或卤泽,不生五谷。匈奴的人口还比不上汉朝的一个大郡。但是匈奴"人人在马背上过活,全国皆是精兵"[1]179。匈奴在战斗本领上也颇有优势。晁错认为,匈奴有三种长技:"1. 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如也。2. 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兵)弗如也。3. 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如也。"[1]179总之,西汉有人力和财力优势,战斗长技又比匈奴还多一些,匈奴虽富有精兵良马,但只要汉朝"把决心立定,把力量集中,匈奴决不是中国的敌手计在这一期内。"[1]183

在唐朝抗击突厥的战争中,唐朝对突厥的优势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优势尤其体现在政治统治局面上。在唐朝初期,虽说刚经过隋末战乱,但已江山一统,社会安定。尤其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既英才挺出,又勤于听政","其一朝贤臣,如王珪、房玄龄……指不胜屈","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古今所鲜见。"[2]389-390总之,既有统一的政府,又政治修明。至于突厥一方,虽"其势骤胜,而政治组织,不能坚凝,自分东西,时生内乱","(突厥)分居一方者皆称'可汗',其尊卑与'大可汗'不甚殊","首领多而无法令。"[4]441突厥的这种状况令唐太宗很蔑视他们:"突厥众而不整,君臣唯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猷师皆来谒我,我醉而缚之甚易。"[4]441在唐朝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当中,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良马优势不再存在,唐朝在建立之初,就已控制了以水草善而盛产良马的河套地区,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在冷兵器时代发挥着重大作用的良马,这使做为游牧民族的突厥原所仰仗的优势大大削减。

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则完完全全是处于劣势的。中国虽是一个人多地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广的大国，但经济技术落后，武器装备差，再加上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剧的侵略掠夺和民国以后国内的连年战争，国力已是十分虚弱，是个不折不扣的弱国。而日本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强国。此外，中国和日本相比，还有一大劣势，那就是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仅存在着明确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红色革命政权，就连国统区实际上也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而日本却是一个拥有统一政府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显然对它发动侵略战争是极为有利的。中国在不统一的情况下进行自卫战争则困难多多，甚至存在着被侵略者各个击破的危险。

三、就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抗日战争集中了西汉抗击匈奴战争和唐初抗击突厥战争的优点，并把这些优点发挥到几乎是极致的程度

在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中，西汉的优势从整体上看是大于匈奴的。能否把这种优势变成胜利的现实，就看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水平了。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匈奴“是一个游牧的民族，没有城郭宫室的牵累，‘来如兽聚，去如鸟散’，到处可以栖息。他们简直用不着什么防线。但中国则从辽东到陇西（辽宁至甘肃）都是对匈奴的防线，而光靠长城并不足以限住他们的马足，若是沿边的要塞皆长驻重兵，那是财政所不容许的。若临时派援，则汉兵到时，匈奴已远遁，汉兵要追及他们，难于捉影。但等汉兵归去，他们又卷土重来。”[1] 180所以，西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根据匈奴的这种特点以及自己的能力制定正确的战略，而唯一的正确战略就是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一劳永逸地大张挞伐，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汉武帝时西汉一方就是在实施了这种正确战略之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唐朝抗击突厥的战争中，唐朝和突厥相比，最大最明显的优势是政治统一，但要把政治上的统一变成强大的国力进而变成战争中的强大的战斗力，也是要看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水平的。而唐朝人在这方面确实做的很好，这不光体现在君主的圣明和贤臣的众多上，还体现在唐朝一系列的制度上。唐朝制度中一向最为人称道的有三种：科举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科举制虽然是对唐朝强盛起过重大作用的制度，但在唐抗击突厥时实施的层次尚不高，“唐代科举法，最隆重者曰制科……称制科及第者著于显庆”[4] 180－181，而显庆是唐高宗的年号，其时已是抗击突厥战争末期了。所以科举制在唐抗击突厥时的影响尚不明显。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尤其是租庸调制）则因为实施的时间早、程度高而对当时的抗击突厥战争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租庸调制“开始宣布于武德二年（公元 619），再宣布于武德七年（公元 624）”[4] 336，府兵制则是从“贞观十年（公元 637）置折冲府”[4] 202开始的。对于实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意义，钱穆有过精彩论述，他认为租庸调制一则因轻徭薄赋而农民负担较小二则因税收项目列举分明而免生横征暴敛，“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2] 413，府兵制则“既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2] 412从而“建立起健全的武装”[2] 413。钱穆的话虽有溢美之处，但租庸调制由于顺应民意而实现了人心的安定和国家凝聚力的增强，府兵制加强了武装力量，应当是较合乎实际的。这些都有利于国家战斗力的提高，从而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又添了几分胜算。

总之，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看，西汉抗击匈奴胜利是由于运用了正确的战争战略，唐朝初期抗击突厥胜利是由于国家既有明君贤臣又有好的制度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抗日战争则集中了两者的优点，并把这两个优点发挥到几乎是极致的程度。从运用了正确的战争战略来说，中国根据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实行了打持久战的战略；根据敌人已深入我内地而且深为中国人民痛恨的特点，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根据敌人战线长、人数少的特点，实行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5]。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使自己具备强大的战斗力来说，中国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并在全国形成了各族人民、各界同胞、各民主党派和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大好局面[3] 55；进行了空前的全民族总动员，从而使全民族形成了强烈的抗战意识，表现了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并使中华民族不怕牺牲、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卫家报国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6]9。之所以说抗日战争把这两种优点发挥到几乎是极致的程度,不仅仅在于中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内容非常丰富,还在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复杂问题时所显示出的卓越智慧。例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国民党实行根本不能胜利的片面抗战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即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这样既维护了统一战线,又实现了全面抗战[3]56。又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什么样的土地政策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因为既要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又要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采用的办法是减租减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6]11-12。再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以其对待抗日和民主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势力(即进步势力、顽固势力、中间势力),为了争取中间势力,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非常别致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按"三三制"的原则,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的统战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6]1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同西汉抗击匈奴胜利、唐朝初期抗击突厥胜利一样,是中国历史上进行自卫性正义战争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战争时期所处形势的艰难而尤其显得可贵。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仍能取得像西汉抗击匈奴战争、唐朝初期抗击突厥战争一样的胜利,就在于它在战争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使这种主观能动性体现出极高的水平。因此,今天的中华儿女应当为我们的先辈能创造出这样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具有这样伟大的功绩而深感自豪和骄傲。

参考文献:

[1] 张荫麟. 中国史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2] 钱 穆.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 丘沐平.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及伟大历史意义[J]. 嘉应大学学报,1995,(3).
[4] 岑仲勉. 隋唐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5] 樊伯欢. 试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特点[J]. 广州师院学报,1995,(4).
[6] 何步兰. 民族魂的凝聚与抗日战争的胜利[J]. 兰州大学学报,1995,(3).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Vic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Aggression, the Xihan Dynasty against the Xiongnu and the Tang Dynasty against the Tujue

WANG Jing-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Son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vic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aggression got the great self-defense success just the same as the war in Xihan Dynasty against the Xiongnu and the Tang Dynasty against the Tujue. The vic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aggression was got in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It concentrated the advantage of the later two victories and developed their advantage to the extreme in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which was the basic reason for getting victory.

Key Words: The war of China against Japan aggression; the war of the Xihan Dynasty against the Xongnu; the war of the Tang Dynasty against the Tujue; victory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